

前言

作为迄今唯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 (Toni Morrison, 1931—2019) 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无可动摇。自 1970 年莫里森发表第一部小说至她逝世，她一生共出版了 11 部小说，每一部作品均赢得读者与评论家的高度赞誉。

国内外莫里森作品相关研究虽异彩纷呈，但从流散的角度阐释莫里森作品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这是因为流散作为新兴的批评工具，直到近些年才被引介并应用于文学批评之中。自 1965 年历史学家乔治·谢泼森 (George Shepperson) 首次提出“非裔流散”的概念，并将其引入学术批评界以来，这一术语的概念便不断地被讨论与定义。科林·帕尔默 (Colin Palmer) 的定义代表了非裔流散研究传统观念，即非裔流散研究应“求同”，搁置地区性差异，强调非洲大陆的同源性和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一共同的苦难经历，鼓励非裔族群联合以求共同发展。而以保罗·蒂亚贝·泽莱扎 (Paul Tiyambe Zeleza) 为代表的另一派观点强调了对非裔流散中差异的尊重，认为流散前既有的和由流散所造成的国别、阶级、文化等差异是非裔流散族群必须正视并解决的问题。如若不然，所谓的联合就只能沦为空谈。

除因地制宜外，非裔流散研究也应因时制宜。卡罗尔·博伊斯·戴维斯 (Carole Boyce Davies) 在《非裔流散百科全书：起源、经历和文化》 (*Encyclopedia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Origins, Experiences, and Culture*) 中将当代非裔流散定义为“诱导性迁移”，以此与前哥伦布时期的“自愿性迁移”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的“被迫性迁移”相区分。她认为 20 至 21 世纪这波非裔流散浪潮源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分配。在全球化背景下，非裔流散群体所面临的挑战已经超越了传统流散行为带来的思乡情绪、与接受地的文化摩擦和身份错位等问题。愈发显著的贫富差距带来的阶级问题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入侵等问题，成为摆在当代非裔流散族群面前的新课题。

伴随学科发展，流散概念也不断历经着嬗变与迁移。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全球人口流动性的显著增强，流散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呈现扩张趋势，整体上呈现愈发强烈的包容性。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探讨了流散活动所致的身份生产与再生产问题，强调了流散的差异性，也涉及当代流散在地缘上另一显著特征，即迭重性。在讨论加勒比流散问题时，霍尔对此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并将其定义为“再流散”(re-diasporize)，认为加勒比既是非洲、欧洲、亚洲流散的产物，也是当代“再流散”的源起。国内对于流散边界的讨论同样颇为丰富。钱超英教授在《“边界是为跨越而设置的”——流散研究理论方法三题议》一文中表明了其对流散概念拓迁的支持，朱振武教授则认为应对流散定义作更为严格的限定，指出区分流散概念的内核问题——文化冲突，强调“流散”应产生于跨文化的语境中。

此外，流散概念及流散文学研究自新时代以来也呈现出后殖民转向，即从消极被害的语境转向自主性及主体性建构的话语体系。从露丝·汉密尔顿(Ruth Hamilton)对流散族群的区别定义中体现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到凯瑟琳·麦基特里克(Katherine McKittrick)的“摆脱受害者思维”，这些观点共同推动非裔流散文学研究主题逐渐从种族压迫、身份认同、家园寻觅等传统议题，转向自身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建构与延续。

结合小说时代和地域背景，因时因地制宜，对莫里森作品中美国及加勒比海地区现代和当代流散问题进行讨论是全面和准确地理解莫里森作品中非裔流散问题的理论基础。

在厘清流散概念发展，梳理奴隶贸易历史背景后，本书主体部分以流散时间和空间的差异为研究导向，分析了莫里森小说中的流散主题，聚焦于15世纪以来的三波非裔流散浪潮，这三波流散浪潮各自具有其相应的地理路径及流散特点。具体来说，本书所涵盖的非裔流散浪潮依次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从非洲到美洲的洲际强制性流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本土的迫使性流散，以及民权运动至今的全球范围内的诱导性流散。通览莫里森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不仅从时间性和地缘性上完整地囊括了现代非裔流散的三波浪潮，同时也涉及与这三波浪潮相对应的三大基本问题，即非裔族群创伤性的流散以及文化除根的经历，非裔族群试图在流散接收地挣扎生存并建设或重

建家园的努力，以及非裔流散族群对故土的怀恋与实际上或想象中家园的回归。

因此，主体部分的三章又进一步划分了三小节，以深入剖析不同时空下非裔流散的三大基本问题。首先，本书梳理了莫里森作品中非裔流散族群不同时期因奴隶制度、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等因素所导致的背井离乡和文化除根现象，揭露了奴隶制及其遗毒对非裔流散族群造成的集体创伤；其次，本书展现了莫里森作品中不同时期的非裔流散族群在保留文化传统与融入白人主导的主流文化的交互作用下的挣扎，以及他们扎根于美国这片土地并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的努力；最后，本书解读了莫里森作品中非裔流散族群对想象和实际家园的回归，揭示了莫里森将美国南方视为非裔美国人精神家园的态度，阐明莫里森将南方精神——源自美国南方黑人社区团结一致反抗种族压迫的集体努力的一种互助互爱的人文精神——视为当代非裔美国人治愈流散创伤的良药和建设家园的精神支柱。

综上所述，本书以流散的时间性和地缘性为纬度，以非裔流散的三大基本问题为经度，纵横交织地从非裔流散视角下对莫里森作品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揭示了莫里森对非裔美国人流散经历的深切关注，剖析了莫里森作品在展现流散主题上内容、时间和地域的完整性。本书还将托妮·莫里森的叙事行为作为广义上的文本，探讨其叙事特点所体现的非裔流散元素，阐释莫里森流散诗学的内涵。莫里森小说的丰富性为当代非裔流散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课题。同时，莫里森对流散问题的讨论也与她对当代非裔美国人的出路问题的持续思考相契合。因此，从非裔流散的视角阐释莫里森的作品有利于更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莫里森这位杰出的作家对非裔美国人创伤性过去的反思以及对于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未来的展望。

目 录

引言	1
一、托妮·莫里森及其作品介绍	1
(一)托妮·莫里森生平与流散经历	1
(二)托妮·莫里森写作生涯与作品简介	3
二、国内外莫里森研究现状	8
三、本书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23
<hr/>	
第一章 流散概念及其理论发展	27
一、流散概念溯源	27
二、流散概念的中国译介	29
三、流散概念的拓迁与发展	31
(一)时空扩散与分支细化——流散外延的扩张	34
(二)边界与越界——流散内涵嬗变的理论思考	37
(三)消极到积极——流散概念及研究的后殖民转向	39
<hr/>	
第二章 奴隶贸易与奴隶制度简述	42
一、非洲奴隶贸易发展史	42
(一)部落时期非洲本土奴隶制度	43
(二)中世纪阿拉伯地区—非洲奴隶贸易	43
(三)工业文明时代跨大西洋奴隶贸易	45
二、北美奴隶贸易规模	50
三、北美动产奴隶制度与特征	54
<hr/>	

第三章 奴隶制时期的洲际流散	59
一、三段式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流散经历	60
(一) 非洲境内的奴隶贸易流散	60
(二) 中段航程的奴隶贸易流散	68
(三) 美洲内部的奴隶贸易流散	79
二、家园建设：文化无根者的生存探索	86
(一) 文化无根者	86
(二) 南方种植园家长制奴隶社区	93
(三) 北方自由州无等级黑人社区	101
三、重返非洲：现实性和想象性回归	114
(一) 奴隶制时期的现实性回归	115
(二) 奴隶制时期的想象性回归	121
<hr/>	
第四章 种族隔离时期的美国境内州际流散	133
一、非裔美国人大迁徙与南方转徙	134
(一) 北上大迁徙	135
(二) 南方转徙	146
二、家园重建：飞地或同化	160
(一) 北方工业城市的种族融合与同化问题	162
(二) 南方文化飞地构建与局限	172
三、回归南方：寻根与南方精神	182
(一) 南方寻根之旅与南方精神找寻	183
(二) 反迁徙浪潮与南方精神重构	197
<hr/>	
第五章 全球化时代的跨国流散	206
一、当代非裔族群的跨国流散经历	207
(一) 无家可归的孤儿	215
(二) 法外逃窜的流浪者	221
(三) 时过境迁后的回乡人	224

二、寻找家园：文化无根性	226
(一) 代际传承与认同困境	227
(二) 异地家园构建与文化悬挂	230
三、问题重重的回归：家园难觅	231
(一) 问题性回归	232
(二) 失败的寻根	235
<hr/>	
结语	241
参考文献	247
致谢	270

引言

作为唯一一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无疑已成为当代美国社会最声名远扬、最喜闻乐见的小说家之一。在给莫里森的颁奖词中，诺贝尔委员会认可了莫里森的文学成就，称扬其在“富有想象力和诗意的小说作品中，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93”）。莫里森著述等身，声华盖代，获此殊荣当之无愧。她一生勤耕不辍，臻于至善，创作了11部小说、3部戏剧、1篇短篇小说以及大量非虚构作品，证明了女性与非裔美国人的双重身份并非固化其作品的标签，而是润养其作品深度与广度的土壤。早在1992年，《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就在评论莫里森《在黑暗中弹奏：白色与文学想象》（*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一书时，赞许莫里森为“美国最接近民族作家的人”（Steiner 1）。然而，三十余年后的今天，这一评论毫无疑问是相当轻描淡写的。莫里森不仅成功地将自己写进了美国文学经典，还获得了巨大的国际赞誉，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托妮·莫里森及其作品介绍

（一）托妮·莫里森生平与流散经历

托妮·莫里森，原名克洛伊·安东尼·沃福德（Chloe Anthony Wofford），1931年2月18日出生，2019年8月5日去世。在当代非裔流散文学中，她的作品具有突出且无可替代的地位。莫里森以精彩、丰富的叙事表达，探讨了非裔美国族群在欧洲中心主义文化冲击下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以及寻找自我的方法。因为莫里森在非裔文学方面取得的威望以及其富于黑人传统的独特叙事技巧，1993年她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人，颁奖词赞誉她“一件一件地把历史还给了非裔美国人”（“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93”）。

祖辈的流散经历以及童年时期频繁的迁居经历成了莫里森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为逃离急剧恶化的种族主义环境，莫里森的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均在“重建”（Reconstruction）后期毅然加入了由南向北的“大迁徙”（The Great Migration）。

这段流散经历犹如两条粗壮的树根，循着祖辈与父辈的言谈举止蜿蜒地攀入莫里森的思维，又借由莫里森的写作蔓延至其作品中。莫里森的祖父母因频发的种族恶性案件由佐治亚州北上迁居俄亥俄州（“An Interview with Toni Morrison” 414）。外祖父母也为了逃离种族歧视并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从亚拉巴马州逃往肯塔基州，并最后落户俄亥俄州。但北方的生活也以漂泊为底色。莫里森出生在位于美国中部的俄亥俄州洛雷恩镇，因为适逢大萧条时期，经济上的拮据加上种族歧视，使得即使她的父亲在做焊工的同时打着几份零工，家庭收支也依然捉襟见肘。据希尔顿·阿尔斯（Hilton Als）的考证，莫里森在童年时期至少搬过6次家。其中一次发生在莫里森两岁时，由于未能按时支付每月4美金的房租，房东便在其家人尚在室内时纵火烧了房子（Streitfeld）。“这是一种歇斯底里、异乎寻常、诡异的邪恶，”莫里森回忆道，“为了每月4美元，有人就能将你炙烤成干（burn you to a crisp）”。种种遭遇使得莫里森深感自己的生活总是“不如或略次于白人”（Als）。

莫里森的童年虽然在物质上并不富裕，但她的家庭仍在艺术与精神层面为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他们为她讲述了无数非洲传统民间故事和奇闻怪谈，而且还潜移默化地让成长中的莫里森受到了传统黑人音乐的滋养。莫里森的外祖父可以不看乐谱，盲奏小提琴，而她的母亲不仅曾为当时的无声电影现场配乐，更是社区教堂的固定唱诗班成员，她常在家中歌唱，“从古典乐到爵士乐到灵歌再到蓝调音乐，有时一唱就是几个小时”（Wagner-Martin 5）。此外，幼年的经历向莫里森灌输了一种语言意识，强化了她的社区概念，为她在未来灵活运用黑人传统口述文学形式，回归黑人传统文化，坚持以黑人社区为中心进行写作埋下了伏笔。

1953年，莫里森毕业于霍华德大学英语文学专业，之后，她前往康奈尔大学进行研究生学习，并于1955年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莫里森在得克萨斯南方大学进行了为期两年（1955年至1957年）的英语教学工作，随后又回到霍华德大学，也就是她的母校，执教长达7年。在1964

年离婚之后，她开始在纽约市的著名出版社兰登书屋工作，并成为小说部首位黑人女性高级编辑。作为编辑，莫里森“精明而不知疲倦”（Als），为推进黑人文学进入主流文学视野作了巨大贡献。其中《黑人之书》（*The Black Book*）便是在起初未被看好的局面下，由莫里森极力促成出版的书籍之一，是一部汇编了从奴隶制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黑人的生活情况，集照片、绘画、歌曲、信件及其他文件于一体的重要文集。

莫里森还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并在那里教授创意写作。她也曾担任过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主席，并获得过多个荣誉和奖项，包括总统自由勋章（2012）、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最高级别的司令勋位（1993）、杰斐逊人文讲座演讲者（1996）、国家人文奖章（2000）、美国国家图书奖（1977）、普利策小说奖（1988）、孔多塞奖章（1994）、赛珍珠奖（1994）、美国全国图书基金会文学突出贡献奖（1996）、索尔·贝娄奖（2016）、美国国家女性名人堂成员（2020）等。

（二）托妮·莫里森写作生涯与作品简介

莫里森的作品常涉及种族、阶级与性别等议题，致力于通过小说中非裔角色的行为和意识来揭示黑人在历史上被忽视、被压制的一面，以反叙事的手法挑战有关奴隶时代的官方叙事。其作品不仅对当代美国文坛影响深远，也让更多的非裔，乃至整个流散群体意识到只有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才能摆脱客体身份，真正拥抱自由，掌握自主性，并重新构建非裔美国黑人特有的文化身份。

自197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直至逝世，莫里森一共出版了11部小说，每一部都获得读者与评论家的高度评价。莫里森在离婚后，一边作为单亲母亲担负着抚养孩子的责任，一边不断扩充脑海中有关蓝眼睛黑人小女孩的故事。在历经5年的写作后，她终于在1970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出版初期，该作品在黑人出版界与大众媒体中都颇受争议，也未能取得良好的销售成绩，但随着学界对其良好的反馈，该作品逐渐赢得了关注与广泛认可（Kachka）。该作品以1941年前后美国黑人遭受的精神奴役为背景，描绘了一个深受种族歧视与家庭暴力等问题困扰的黑人女孩佩科拉的成长历程。莫里森借佩科拉懵懂的眼睛，揭露了20世纪美国社会的种族偏见和文化压迫对黑人，特别是对

黑人女性和儿童造成的摧残和剥夺，深刻探讨了黑人的种族身份、认同困境、黑人对白人中心主义审美与价值观的内化，以及自我认知与社会期望之间的矛盾等问题。

1973年，莫里森另一部长篇小说《秀拉》(*Sula*)问世，在出版界与评论界取得了双重成功，并于1975年被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秀拉》的故事时间跨度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至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小说以女主人公秀拉与女性友人奈尔的友谊，以及秀拉成长经历为主线，绘制出俄亥俄州梅德林市一个富有传奇和魔幻色彩的黑人社区“底层”(Bottom)在四五十年间的生活变迁图景。该书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探讨了种族歧视与黑人女性的自我成长，友情、爱情与婚姻，生与死，善与恶，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等多重主题。此外，如果将“底部”黑人社区视为书中人物的家乡，人物的人生阅历也多富有流散色彩，如伊娃无人知晓的出走、伊娃儿子李子的参军、秀拉10年“大学”之旅等等。虽然人物都有着不同的结局与故事，但最后都选择回归“底部”这个小小的黑人社区。他们不同形式回归的外衣下却有着相同的内核，即试图在身份被剥夺的情况下，通过重新连接自己的文化来实现身份的重建与自我认同，暗示着非裔美国人只有在回归本族群文化的基础上，才能认清自我，找到最终出路。

1977年，《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问世，一举成为当时销量最高的小说之一，随后也被选入“每月读书俱乐部”的选集之中，这是继1940年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的《土生子》(*Native Son*)以来该俱乐部第二次选取非裔作家的作品(Busby)，该作品也在1978年为莫里森夺得了美国国家书评奖。该作品以“会飞的黑人”这则古老的民间传说为故事主线和象征核心，讲述了北方城市一个富裕黑人家庭的小儿子奶娃南行故土寻找金子，从而意外重拾家族之根、文化之源的故事。故事创作的70年代末，肇始于20世纪初的举家北上的大规模“大迁徙”浪潮已然浪竭，与之相对地产生了自北向南，回归故土的“反迁徙”(return migration)浪潮(Cromartie and Stack 297)。而莫里森则以如炬的目光，观察到这一现象，并通过奶娃的旅途，阐释了对该问题的思考。在一站一站的南下旅途中，奶娃不断将白人文明带来的拜金主义、物质至上等特性剥除，将对自然的亲近、对实用价值的追求等黑人优秀传统赋予自身，

最后在沙理玛这个家族根源所在地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归属感。旅途揭示出非裔美国人内部间的代际、性别、贫富等冲突，提出了在物质生活日益发展的今天，如何才能充盈非裔美国人贫乏的精神生活，破解其文化无根性问题的解决之道。

20世纪80至90年代间，莫里森共出版了4部小说。分别是1981年的《柏油娃娃》(*Tar Baby*)、1987年的《宠儿》(*Beloved*)、1992年的《爵士乐》(*Jazz*)，以及1999年的《天堂》(*Paradise*)。《柏油娃娃》的故事发生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描写了“儿子”和吉丁等主要人物对生活道路的不同选择，以及如何在生活的漩涡中挣扎并追寻自己的文化身份，折射出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及白人文化与黑人文化的矛盾。

《宠儿》出版于1987年，莫里森凭借该作品获得1988年的普利策奖，这也使她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非裔女性作家。这部长篇小说取材于一段令人触目惊心的真实历史，书写了女性奴隶塞丝在携女逃亡途中遭到追捕，因不愿看到孩子再次沦为奴隶，毅然扼杀女婴的故事。而18年后奴隶制已然废除，被她杀死的女婴则还魂归来，以复活的肉身日夜纠缠并惩罚母亲当年的行为。《宠儿》从黑人女性的边缘视角出发，以不同于主流历史的视角记载了黑人受压迫的历史以及持续久远的创伤文化，揭示了两代黑人间的代际创伤，“它用创伤叙事方式来重述黑人悲悼创伤、建构自由黑人新的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张杏玲 125）。

《爵士乐》以20世纪初美国黑人“大迁徙”浪潮为背景，当时的美国南方，种族环境恶劣，黑人在遭受《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种族隔离制度等系统性种族歧视的同时也受到佃农制度的经济剥削，加之三K党等极端种族组织的威胁，大量黑人逃离南方农场，前往北方城市寻求生计。乔和维奥莱特便是其中一对黑人夫妇。1906年，他们怀揣着炽热的“美国梦”，随着移民浪潮从美国南方来到了北方大都会纽约，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繁华都市的鳞次栉比与灯红酒绿背后是他们蜗居棚户、捉襟见肘的现实。白手起家的幻梦破灭后，乔只能将一腔踌躇寄托于18岁女高中生多卡丝，企图从青春的肉体中捡拾起几分曾经的雄心，而多卡丝移情别恋后，备受打击的乔则愤然举枪结束了多卡丝的生命；而维奥莱特先是气急败坏地大闹多卡丝的葬礼，后来在了解了多卡丝心路历程和成长轨迹的情况下，用爱和宽容接纳了一切，与乔重归于好。

二人自南向北的大迁徙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错位感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危机。南方家园既是流散非裔走出过去创伤的力量源泉，又是他们在构建新身份时不得不压抑的痛苦根源。在故事的叙述中莫里森采取了与标题“爵士乐”一般的叙述手法，对主流白人霸权文化吹起了反抗的号角，让沉默的黑人发声，以此暗示非裔美国人必须如以即兴著称的爵士乐一般不断地重塑自我（王焯焯 160），才能在苦痛的历史阴影下，在变化的现实社会中，构建出属于自我的文化身份。

《天堂》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非裔美国族群的精神悲剧。故事围绕两个均呈现出较强的独立性与封闭性的黑人聚居区——小镇鲁比与女子修道院——展开。小镇最初是一群在社会中屡屡碰壁、无家可归的黑人秉持着建立一个黑人能够享受着自由与保护的乐园为目的而建造的，而这一目标也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得以实现。但随着小镇发展，其内部矛盾不断激化。而部分掌握权柄的男性镇民非但未曾反躬自省，反而将问题矛头转向庇护附近受创女子的修道院，将其视为“罪恶”根源，并最终血洗修道院。故事的悲剧结局与书名形成巨大的错位与反差。在这部作品中，莫里森“在非洲美国民间故事和传说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历史”（刘晓文 86），并通过多角度的叙述手法“间接揭示了历史的不可靠性”（崔婷 158），否定了官方叙事。通过鲁比和修道院内两个不同群体的行为，莫里森揭示了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南方辗转找寻和构筑家园过程中遭遇的外部压迫以及内部隔阂与嫌隙，并以隐晦的方式暗示了弥合罅隙，构建真正的黑人家园的方式与要义。

进入21世纪，莫里森于2003年出版了又一部长篇作品《爱》（*Love*），这部小说以美国20世纪中叶为背景，以名叫“爱”的年轻女性主人公为中心展开了故事。该小说讲述了成功的商人柯西破坏伦理禁忌，强娶孙女克丽丝汀少时的好友，年仅11岁的留心为第二任妻子，以致祖孙三代家庭成员均陷入伦理困境。莫里森通过精致的叙事和人物塑造，将主人公家庭内部矛盾交织于种族歧视与阶级不公的社会大背景中，揭示了个体困窘与族群困境，也呈现了非裔个人与族群对和谐与自由的追求。该作品中，莫里森对非裔美国人历史创伤有了新的思考，进一步将白人种族主义，这一非裔美国人集体梦魇的制造者埋入隐形叙事，而着重将“历史的责任直接指向内部，显示了直面种族内部，正视自我的勇气”（唐红梅 36）。

莫里森2008年出版的《恩惠》(A Mercy)将故事背景设定于17世纪后半期的北美殖民地弗吉尼亚地区,是莫里森作品中对历史的回溯最早的一部作品。这个殖民扩张日益深入、奴隶贸易日渐猖獗的时代复杂混乱,不同殖民者间、殖民者与本土印第安人间、殖民者与非裔奴隶间的斗争不断;同时,他们又共同面临着物资匮乏、开垦艰难的拓荒挑战。因此,小说以多个视角和时间线,呈现了一个种族、性别、阶级、代际、国别等问题与复杂人性绞缠下的纷繁叙事。故事的主要情节围绕着一个被抵债而转卖的年轻非裔奴隶女孩佛罗伦斯展开。故事中出现了一系列人物,包括佛罗伦斯的新主人——美国白人农场主雅各布、他购买的印第安女性奴隶莉娜、他自英国“邮购”而来的白人妻子丽贝卡,以及他们收养的混血女孩“悲哀”。通过这些族裔各异的角色互动,莫里森除了揭露奴隶贸易与奴隶制度对非裔群体以及印第安人的残酷剥削外,也探讨了殖民行为与奴隶制对本性善良、宽和的白人带来的扭曲、改造,甚至压迫。《恩惠》以莫里森独特的叙事风格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勾勒出了一个充满痛苦与希望的殖民时代,展示了人类关系的复杂性与脆弱性。

2012年,莫里森中篇小说《家》(Home)问世。在其中,莫里森着重刻画了因参与战争而罹患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主人公弗兰克,讲述其拯救妹妹的同时自我救赎的故事,并通过不同叙事视角与时间线,展现了兄妹记忆中的南方家乡以及他们回归后重新认知并参与重建的家园。《家》的母题既贯穿了兄妹二人的成长,也是非裔美国人群体历史与命运不可分割的母题。小说表明只有“家”才能治愈流散在美国的黑人过去与当下受到的戕害,也只有通过黑人社群的相互理解与团结,才能更好地打造更和谐的家园。

2015年莫里森完成了其最后一部小说《孩子的愤怒》(God Help the Child)。故事围绕着名叫布莱德的年轻黑人女性展开,讲述了童年创伤如何塑造并扭曲了其成年的生活。布莱德从小就因自己黝黑的肤色而受到母亲的冷落和其他人的偏见。长大后,她成为一名成功的职业女性,并投身于化妆品行业。然而,她内心深处仍然痛苦不堪,被童年的创伤所困扰。通过对人物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的描绘,以及时间线的穿插和叙事的碎片化呈现,小说展现了莫里森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入人心的人物刻画。此作品是莫里森为数不多的具有当代背景的作品之一,探讨了种族

主义和肤色歧视对儿童的影响、儿童遭受不当性剥削导致的创伤，以及母亲和孩子在一个被种族主义暴力破坏的世界中面临的严酷现实相关的主题。

总而言之，莫里森是一位出色的严肃文学作家，她的文学创作以美国的黑人生活为主要内容，涉及身份认同、文化碰撞以及迁移行为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等主题。作品中新奴隶叙事、声音叙事、黑人女性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创作技巧交织并行，又化入其细腻的笔触与斐然的文采中，因此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莫里森本人的非裔美国人身份，以及其家庭与本人的流散经历，又促使其能够从多重文化的角度出发，书写出对流散者处境有洞察力、有思考深度的作品，其作品也成为了人们了解非裔美国人流散经历与多重困境的重要窗口。

二、国内外莫里森研究现状

随着莫里森声名鹊起，人们对她及其作品产生了愈发浓厚的兴趣。其作品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评论家投身研究，他们从不同视角对其作品进行探讨，撰写论文、专著和选集来表征自身观点。在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出版50余年后，学界对莫里森作品的批判性解读已经成果累累，乃至全面而准确的总结显得有些吃力。本书尝试追随莫里森自身创作思想的进步与变化，以及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莫里森研究进行简要梳理。

20世纪70年代的评论家们受被誉为“第二次黑人文艺复兴”的“黑人艺术运动”（1965年至1970年初）影响，倾向于采用社会政治的视角探究莫里森的早期作品，揭示其种族与阶级意识。1977年冬季出版的《第一世界》（*The First World*）以推广非裔美国作家为使命，其中两篇文章专门介绍了莫里森的作品：一篇是菲利普·罗伊斯特（Philip Royster）的《最蓝的眼睛》，另一篇是奥黛特·C.马丁（Odette C. Martin）的《秀拉》；这两篇文章为确立莫里森为非裔美国代表作家奠定了基础。

到20世纪80年代，以罗伯特·B.斯特普托（Robert B. Stepto）和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为代表，批评界关注的焦点发

生了偏移。盖茨贬斥黑人艺术运动为美国黑人文化史上“最短暂、最不成功”的运动（“黑人创造力”），他主张应该减少对文学评价的政治干预，并在《黑人文学与文学理论》（*Black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1984）中呼吁对文本进行“内部研究”，并尊重文本的本质，即“依循一套复杂规则运行的修辞结构”（Gates 5）。此外，贝西·琼斯（Bessie Jones）与奥黛丽·文森（Audrey Vinson）于1985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莫里森研究的专著《托尼·莫里森的世界：文学批评的探索》（*The World of Toni Morrison: Explorations in Literary Criticism*），尽管该书与其说是一种深刻的理论探索，不如说是一种教学工具，但也表明了人们对莫里森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一点照应了南希·彼得森（Nancy Peterson）的总结，即学界的逐步关注再加上批判理论的快速发展，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莫里森研究“多样性与丰富性……呈指数级增长”（6）的局面。

1993年莫里森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极大地推动了莫里森研究的发展。2003年，人们对莫里森生平、成就及其作品的批评方法的需求愈渐扩大，伊丽莎白·安·博利厄（Elizabeth Ann Beaulieu）编著的《托尼·莫里森百科全书》（*Toni Morrison Encyclopedia*）也应运而生。这本书记录了包括种族、性别、阶级、文化等在内的各种观点，以及各种批评理论，包括黑人女性主义、美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生态批评等。这本百科全书对20世纪莫里森的研究进行了简明扼要又相当全面的总结，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指南。总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莫里森的研究已进入理论多元化阶段。

黑人女性主义是研究莫里森作品的一种主要批评方法，也是最早欢迎和呼吁更多样化批判范式的方法之一。黑人女性主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失望和反对中应运而生的，它关注黑人女性的双重压迫与交叉地位，特别是黑人女性问题是如何被民权运动和第二波女性主义选择性地忽视的。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1977年的《走向黑人女权主义批评》（“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是一篇纲领性的宣言，提出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概念，承认“性政治以及种族和阶级政治是黑人女作家作品中至关重要的相互关联的因素”（170），她指出了女性主义与黑人女性的密切关系，强调了运用黑人女性主义方法对黑人女性作品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并运用此方法将莫里

森的《秀拉》解读为一部刻画女性间同性之爱的小说。随后，黛博拉·麦克道威尔 (Deborah McDowell) 对史密斯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想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她在1980年发表的论文《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for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中主张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置于黑人文学与黑人文化的语境中，反对仅以白人女性的经验作为女性批评理论的唯一标准。她指出：

不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者选择哪种理论框架，他们对黑人文学和文化的全面掌握都是必要的。这样的基础可以提高研究的质感与完整性，甚至可以阻止某些对研究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的产生。这种立足于黑人历史和文化的立场是研究黑人女性作品的基石。(192)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演变是相当迅速的，这可以归因于批评运动与黑人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此期间，一些优秀黑人女性作家及其作品重新获得欣赏。显然，莫里森在这些顺应潮流而崛起的作家中尤为突出。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莫里森的作品已经被各种有影响力的黑人女权主义者关注和研讨，如马乔里·普赖斯 (Marjorie Pryse) 和霍坦丝·斯皮勒斯 (Hortense Spillers) 于1985年出版的《魔术：黑人女性、小说与文学传统》(*Conjuring: Black Women, Fiction, and Literary Tradition*)，以及同时期的芭芭拉·克里斯琴 (Barbara Christian) 的著作《黑人女性主义批评：黑人女性作家视角》(*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Perspectives on Black Women Writers*)。专著中，克里斯琴肯定了莫里森对于黑人内化白人优越论与价值观现象的揭露和反击。康奈尔·韦斯特 (Cornel West) 也在《差异的新文化政治》(*The New Cultural Politics of Difference*) 中认为，托妮·莫里森这样的“黑人流散女性”背后的黑人女性运动构成了对本质主义批判的致命一击，“随着黑人男性对黑人主体构建的垄断地位的终结，对黑人主体的天真的本质主义论调终于得以封棺埋葬，”(104) 差异性多元性的主张也由此得以革故鼎新。休斯顿·贝克 (Houston Baker) 则提出“莫里森在对非裔美国人场所的编码中，最终寻求的是一种出自女性意识

的对亲密的、系统化的、有序的黑人乡村价值体系的写作，这种书写始终关注着黑人女性的自我支配”（136）。

在世纪之交，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愈加关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建设的同时，致力于挖掘黑人女性作品中除了对性别、种族双重压迫批判外的更多元、更深层次的价值。奥伊·莫丽（Aoi Mori）在《托妮·莫里森与女性主义话语》（*Toni Morrison and Womanist Discourse*）一书中，从“妇女主义”（womanism）理论出发，在阐释莫里森通过其作品恢复非裔美国人民族身份，打破性别掌控的同时，也挖掘了其作品如何通过非裔的口头叙述和民间神话的再书写，在复兴非裔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其独特的写作风格。艾格尼丝·舒拉尼（Agnes Surányi）也在论文《〈最蓝的眼睛〉与〈秀拉〉：黑人女性从童年到成年》（“*The Bluest Eye and Sula: Black Female Experience from Childhood to Womanhood*”）中以成长小说的视角观察了一个成长于充满恶意的世界中的黑人女性可能遭遇的种种困境。伊丽莎白·安·博利厄的《黑人女作家与美国新奴隶叙事：解放的女性气质》（*Black Women Writers and the American Neo-Slave Narrative: Femininity Unfettered*）则考察了包括莫里森在内的当代黑人女性作家如何以女性和母亲的视角，对奴隶制度进行再书写，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新奴隶叙事。卡罗尔·戴维斯所著的《黑人女性，书写以及身份：主体的迁移》（*Black Women, Writing and Identity: Migrations of the Subject*）则在对莫里森等黑人女性作家的研究中加入了流散的视角，讨论了其作品中常见的“移动性修辞”以及女性角色们的“出走与回归”（148）。

另一个对莫里森作品进行研究的重要视角便是母性研究。对于一个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黑人母亲来说，莫里森对于母性的看法显然有别于传统白人的母性观。学者帕尔文·加塞米（Parvin Ghasemi）认为，对莫里森来说，“母亲首先是具有自己独特身份的人，只要条件允许，她们就应当可以意识到母性与个性并不互斥，”她还进一步提出莫里森对于母亲形象的描绘“与将母亲理想化的主流观念相冲突，并质疑了这种无法将母亲的身份与个性同孩子剥离开对母权与母性的社会建构”（Ghasemi & Hajizadeh 477）。露易丝·罗斯（Lois Rosen）也对莫里森独有的母性概念进行了阐释：“母性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她所有小说的中心，她能够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上吸收非裔美国人对于母性的解读，并去除社会

强加在这种母性上的限制，从而揭示出母性经验中的普遍人性。如此，她消解了母性角色的界限，创造出一个不断扩大的、跨代际的母性概念(218)”。不少文学批评者都对莫里森作品中的母亲形象进行了相当深入细致的分析。安德莉亚·奥雷利 (Andrea O'Reilly) 在她的著作《托妮·莫里森与母性：心灵政治》(Toni Morrison and Motherhood: A Politics of the Heart) 中认为莫里森将书中的母亲身份定义为“黑人女性的权力场”(1)，并剖析了黑人女性在面对奴隶制度、迁徙流散、性别霸权、文化入侵与同化等割裂母性的千难万险时，是如何一面斗争，一面疗愈，并最终实现自我赋权并为子女赋权的。玛丽安·赫希 (Marianne Hirsch) 则在论文中指出，“《宠儿》中的母性主题是那些最压抑、最难以言说的文化记忆与叙事的载体”，因此这些“对母性记忆的‘再记忆’ (rememory) 成为抵抗与反对的场域”(96)。

也有许多学者对莫里森小说中的母子关系进行了探讨。特鲁迪尔·哈迪斯 (Trudier Harris) 指出《宠儿》中塞丝的杀女情节为我们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是否存在特殊场景使得母亲对自己的儿女享有生杀之权？如果有，她们的内疚感足以成为她们的惩罚吗？还是她们应当受到恶魔般的折磨？”(388)。卡罗尔·戴维斯则强调了《宠儿》的“双声性”与“多重性”，指出作品“在对排他性的母爱进行批评的同时，强调黑人女性确有必要将某些事物据为己有”(“Mother Right/Write Revisited: Beloved and Dessa Ro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therhood in Black Women's Fiction” 45)。瑞贝卡·斯通 (Rebecca Stone) 在《母乳也能哺育母亲吗？追溯托妮·莫里森〈宠儿〉中的母性主体》(“Can the Breast Feed the Mother Too? Tracing Maternal Subjectivity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中同样指出了母亲身份的双重性，探讨了黑人母亲在哺乳期作为客体的特征，并认为“对于母亲与婴儿来说，母亲的身体是一种矛盾和创造的来源”(298)。特蕾莎·N.华盛顿 (Teresa N. Washington) 则另辟蹊径，从非洲约鲁巴 (Yoruba) 文化中仅在母女间代际传递的，女性特有的神秘精神力量 *Àjé* 入手，解析了《宠儿》中纵横交错、有悖常理的母女关系。维多利亚·巴罗斯 (Victoria Burrows) 在《白人性与创伤：简·里斯，牙买加·琴凯德与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母女情结》(Whiteness and Trauma: The Mother-Daughter Knot in the Fiction of Jean Rhys, Jamaica Kincaid and Toni Morrison)

中讨论了莫里森《秀拉》中由“残酷的贫穷与普遍的社会苦难”导致的常常无法以正常语言表达的母爱(129)。伊芙琳·贾菲·施莱伯尔(Evelyn Jaffe Schreiber)则从创伤角度出发指出了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等多部小说中均存在“创伤的代际传播”(2)。

另一个在莫里森的批评中举足轻重的思想流派是后现代主义。许多评论家认为莫里森加入了当代作家对文本进行后现代主义探索的行列。多数莫里森作品的后现代主义讨论都集中于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琳达·哈钦森(Linda Hutcheon)在其对后现代性的讨论中将莫里森与其他边缘出发进行书写的作家行列,认为他们解构了大写历史,对大写历史的定义者,那些“英雄主义胜利者”避而不谈,却热衷于书写那些“平民与失败者”(51)。埃利奥特·巴特勒·伊万斯(Elliott Butler-Evans)就认为《柏油娃娃》中通过“仿作(pastiche)与拼贴”的手法以及精神分裂式的结构,“用‘历史主义’代替了历史,使得过去在当下得以重读与重构”(152)。金伯利·查波特·戴维斯(Kimberly Chabot Davis)对此提出了反驳,认为这种对真实历史与非真实的历史主义的区分过于机械,而“对莫里森来说,‘历史’与‘历史主义’并无区别……她质疑了在不真实的模拟或再现背后有一个可知现实的假设”(248)。拉斐尔·佩雷斯-托雷斯(Rafael Pérez-Torres)则将后现代理论的解构策略与历史文化批评的意义连接在一起,在论文《编织并绾结起叙事线索——后现代小说〈宠儿〉》(“Knitting and Knotting the Narrative Thread—*Beloved* as Postmodern Novel”)中将《宠儿》解读为“社区话语力量的一种‘再记忆’(rememory),一种批判权威压迫性实践的元叙事,一种对具化他异性的后现代主义发起挑战的后现代文本”(707)。芭芭拉·里格尼(Barbara Rigney)也探讨了莫里森小说的后现代历史观,认为莫里森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均是“历史小说”,是承载了包含奴隶制、重建、大萧条、战争等历史见证的“准纪录片”,但莫里森又通过作品实现了对大写历史的解构,将历史视作“一个残酷的幻想或是一个半忆半忘的噩梦”,让人模糊了现实与象征的区隔(61)。罗伯特·鲁宾斯坦(Roberta Rubenstein)则指出《爵士乐》使用“交叠且不连贯的”(“History and Story”154)碎片式叙述模式,完全打破时空的延续性,将被报道或目击的真实历史事件与“真相”并置或让位于人物的“推测、臆断、想象”(155),甚至梦境与潜意识,使作

品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玛丽安娜·德蔻芬 (Marianne Dekoven) 则结合了后现代主义与后乌托邦思想, 认为虽然莫里森作品的“后现代性政治想象无法容纳一个普适性的乌托邦”, 但它可以构建一个“零散的, 与其中居者一样并不完美的民主社会”, 这样的乌托邦是对为了“地方的, 部分的, 已然妥协过的自由、正义与平等而斗争” (125) 的想象。

也有一些对莫里森作品的后现代主义解读将重心放在其精妙的叙事技巧上, 但莫里森作品的复杂性、模糊性与多元性又常常使学者们的解读呈现一种有趣的不统一性和对话感。例如, 安东尼·希尔弗 (Anthony Hilfer) 指出莫里森的叙事有一种“兼而有之的”“辩证的”“不确定”的特点 (91), 它植根于非裔美国文化, 带有一种“饥饿与不安”, 用“回避与颠覆” (92) 实现对“不可言说” (93) 的书写。菲利普·佩奇 (Philip Page) 进一步延伸了莫里森作品的多元性, 认为“相较于传统西方男性非此即彼的二分视角……女性经历往往指向双重性” (包含但不限于“双重意识”的双重性), 而这种双重性恰恰又是非裔美国人的日常 (9-10)。因此兼具了女性与非裔身份的莫里森作品呈现出一种“融合与碎片 (fusion and fragmentation)” 或曰“多元一体 (plurality-in-unity)” 的特征 (3)。同样关注到作品中的碎片化问题的梅·亨德森 (Mae Henderson), 认为碎片化的确还原了奴隶制带来的支离破碎, 但莫里森的“再记忆”又带来了整体性重构的可能: “如果肢解使得整体性被拆解, 将其分割成各种离散与异质的碎片, 那么再记忆的功能就是通过叙事重新收集, 重新组装和组织, 构建起一个有意义的连续性整体” (71)。而对故事的完整性又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凯瑟琳·雷恩沃特 (Catherine Rainwater) 就认为托妮·莫里森否认了传统启蒙与成长小说惯用的闭合性, 认为莫里森小说中的“循环的叙事模式总是试图但又明显不能够闭合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故事不同线索的源起与结局总是难以捉摸” (101)。

甚至学界也存在一些有趣的异议之声, 否认或者重新定义了莫里森作品的后现代性。如约翰·杜瓦尔 (John Duvall) 就对上文提及的琳达·哈钦森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认为莫里森的作品并不符合哈钦森的后现代主义范式。杜瓦尔主张, 与品钦和德里罗等作家相比, 莫里森的作品“并未明确包含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质疑”, 因此莫里森难以被划分为“主流的后现代主义者” (17), 而对其作品更准确的定义应当是“一种部

分后现代化的现代主义”，是“对真实身份的现代主义渴望”与“对所有身份构建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解”（18）的中间地带。

其他值得我们关注的莫里森文学批评理论是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Bhabha）、小亨利·路易斯·盖茨等著作的大量出版，逐渐走向成熟。许多学者采用这种批评方法对莫里森的作品进行研究，关注的是“国内/内部殖民主义”问题。例如，玛丽·埃利奥特（Mary Elliott）探讨了《宠儿》中，“庞大的蓄奴社会对黑人身份的否定与压制”如何导致“对殖民话语的内化”，进而导致即便从身体奴役中解放，部分人仍无法、仍需要长期卓绝的斗争才能实现“发展自我赋权的主体性”（181）。梅赫里·拉兹米（Mehri Razmi）与蕾莉·贾马利（Leyli Jamali）则关注到同一部作品如何利用魔幻现实主义实现去殖民化，并将其视作“投射非裔美国前奴隶们后殖民经验的有力且有效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攻击欧洲中心主义定义的稳定性”，还可以“描绘美国历史上无数代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被掩藏与消音的声音”（111）。即便是莫里森描绘当代非裔美国人生活的作品也有学者从后殖民的视角进行分析，并剖析殖民活动对非裔美国人群的长久而深远的影响。戴尔芬·格拉斯（Delphine Gras）在《孩子的愤怒》中指出：“奴隶制的余孽依旧享有对黑人女性身体支配权，决定着在21世纪的美国，黑人女性的身体如何被看待与对待”（1）。萨哈尔·马沙奇（Sahar Mashaqi）等人则关注了《孩子的愤怒》中臣属性（subalternity）的不同形式、被边缘化的臣属角色的作用，以及来自不同背景人物间的后殖民话语，并认为“臣属性在内容与形式上塑造了整部小说”（177）。此外还有将后殖民与其他学科或者批评理论进行结合的视角。珍妮佛·泰瑞（Jennifer Terry）将后殖民主义与生态批评结合，探索了“殖民与地方的关系”，以及“非裔美国人对自然世界的感受”（127）。莫里森的后殖民研究通过展示非裔美国人与来自非洲大陆的人之间的相似性，为流散研究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琳达·库里斯（Linda Koolish）则结合电影表现探讨了莫里森《宠儿》的叙事呈现的后殖民特征，她指出莫里森通过一种“自我不被消融”的奴隶叙事，提供了“对奴隶制度期间及以后那种畸形、不完整、黯然失色的黑人女性叙事的重新审视”（421）。

中国对托妮·莫里森的早期研究落后于美国，这当然无可厚非。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以翻译和导论为主，多局限于对种族斗争的讨论，缺乏理论探索。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随着诺贝尔奖的获奖报道，中国学者对莫里森的认识越来越多，此后关于其作品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上世纪末，王守仁、吴新云的专著《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标志着中国莫里森研究的成熟。许多莫里森的早期研究都采取了较为传统的文学批评视角，如研究其创作手法以及文章结构等。杨仁敬的《读者是文本整体的一部分——评〈最蓝的眼睛〉的结构艺术》对小说动静结合，又由四季组合衔接的结构进行了评析；唐红梅的《〈所罗门之歌〉的歌谣分析》则讨论了书中“所罗门之歌”对叙事“连接和转换”（109）的结构性功能以及其飞行内涵对主题表达的作用。从其他叙事学角度入手的研究也很多，如刘君涛的《从镜像结构看〈秀拉〉的人物组合与叙事风格》、王晓兰、钟鸣所写的《〈宠儿〉中叙事视角的转换及其艺术效果》、王丽丽的《时间与叙事——解读托妮·莫里森的长篇小说〈宠儿〉》、杜维平的《〈爵士乐〉叙事话语中的历史观照》等等。主题分析也是颇为常见的研究选题，如周小平在《“我早该想到那些鸟意味着什么了”——读托尼·莫里森的〈秀拉〉》中分析了小说女性自我建构以及价值实现的主题，杜志卿在《〈秀拉〉的死亡主题》中对文本的死亡主题进行了剖析，徐文培也在《〈所罗门之歌〉中疏离的人际关系》中指出小说中的疏离关系是作品主题表达很重要的一部分。

随着批评理论的发展，也有学者借助后殖民与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讨论莫里森的作品。王守仁、吴新云二人对《最蓝的眼睛》展开剖析，指出虽然黑人已摆脱奴隶制的桎梏，却转眼又要深陷白人的文化浸染困境中。习传进从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出发，对莫里森《宠儿》的创作特色进行了分析，分析了《宠儿》如何通过不同艺术手段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审美效应”（108）。田祥斌的《南北美洲交相辉映的两朵艺术奇葩——论〈百年孤独〉与〈所罗门之歌〉的成功与魅力》也对比了两部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阐释了两位作者于相同写作手法下各自遵循的独特艺术原则，以及由此所展现出的差异化艺术功能，揭示出两部作品在同源手法运用上的殊途同归与各自精彩。在《托妮·莫里森小说的叙述特色》中，高继海区分了莫里森的不同创作阶段，深入探究了其叙事手法的

演进，提出莫里森写作呈现出“反传统的尝试——冷峻的零碎——省略、离题与逆时序——反高潮叙事”的发展脉络。

近年来，另一种较为流行的研究方法是用空间策略这一理论工具来考察莫里森的作品。例如赵莉华的《空间政治：托尼·莫里森小说研究》、赵宏维的《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都岚岚的《空间策略与文化身份：从后殖民视角解读〈柏油娃娃〉》、赵辉辉与黄依霞的《空间视域中黑人女性的身份建构——以托尼·莫里森的〈秀拉〉为例》，以及许克琪、马晶晶的《空间·身份·归宿——论托妮·莫里森小说〈家〉的空间叙事》。文永超则另辟蹊径，从人地间的关系，即场域依恋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场域感”对于黑人群体美国身份构建的重要性，并认为《所罗门之歌》中的多个人物经历了复杂的地理位移，远超上文提及的罗伯特·斯特普托在《面纱之后：非裔美国叙事研究》（*From Behind the Veil: A Study of Afro-American Narrative*）中提出的“上升”与“沉浸”的二元叙事模式（67）。

除此之外，一个颇具创新性的研究方向是听觉叙事的视角。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有李美芹的著作《用文字谱写乐章：论黑人音乐对莫里森小说的影响》，以及周亮亮、张小平的论文《听觉叙事与民族记忆——以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为例》。二者皆认为听觉是莫里森构建黑人民族特征，塑形黑人民族记忆的重要方式。前者对莫里森作品中黑人音乐在创伤疗愈、精神家园建设、苦闷抒发等方面的作用，以及黑人音乐对莫里森叙事结构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该著作系国内首部，目前也是唯一一部对莫里森作品与黑人音乐之间关系进行综合论述的专著。后者则涉及沉寂、狗叫、流水、树木等诸多复杂的听觉元素，将民族记忆与听觉实践连缀一处，指出听觉模式的转变方为融入民族记忆的真正途径。相较于前者，笔者的《听觉叙事视域下〈孩子的愤怒〉中的次级受害研究》弱化了常规研究中听觉的民族构建作用，聚焦于其不可见性特质，提出隐匿于文本的音景驱动着人物的精神转向，揭示文本中被视觉遮蔽的声音，确立了莫里森作品中听觉描写的文学价值。

同样一个较新的视角是战争书写。胡亚敏的《托尼·莫里森〈家〉中的民族空间与黑人战争书写》关注到了莫里森作品中战争对黑人的特殊含义，将战争创伤的治愈与黑人传统文化的独立联系起来。鲁作琼也在《经历·言说·回归——托尼·莫里森〈家〉的战争创伤书写》中着重阐述

了非裔在战场上所遭受的战争创伤以及战后因种族歧视而产生的种族创伤，同时指出莫里森对美国南方黑人及黑人社区所具有的治愈效果持积极态度。

有的学者受“物”转向风潮影响，另辟蹊径，从小处着手，“于无声处听惊雷”，从景观、饮食等元素出发，使所谓的“背景因素”走到幕前来。景观研究的代表有王绍平和周奇林合著的论文《景观言说与记忆书写——〈天堂〉中的景观叙事研究》以及笔者的《后殖民时期的加勒比海地区——论莫里森〈柏油娃娃〉中的风景政治》。两篇论文都将景观视作一种“视觉符号”，前者将景观作为铭刻黑人记忆的碑文，对非裔集体记忆以及非裔族群内外的矛盾进行分析；后者更加凸显了景观的主体性，强调其作为抵抗力量，与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活动间的权力斗争。饮食研究的代表论文成果有刘彬的《食人、食物：析〈天堂〉中的权力策略与反抗》、刘芹利的《论〈最蓝的眼睛〉佩科拉疯癫之路的食物话语》以及文永超的《从“味蕾消失”到“口感如同神赐”——论〈孩子的愤怒〉中的场域依恋建构》。三者关注到莫里森笔下细致入微的饮食描写，将其与权力、意识形态与身份建构结合在一起，将饮食及饮食实践活动视作一个完整而特殊的符号系统展开整体性研究。笔者的《口味政治：〈柏油娃娃〉的后殖民饮食研究》以饮食为镜，既反映书中人物基于阶级、种族的权力博弈，更呈现霸权殖民与新殖民的权力更迭和历史动态，将饮食视作故事发展的关键推力，并阐释了饮食作为“物质—符号”综合体的特殊性质。

比较文学方面，国内的学者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唐红梅所著的《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美国黑人女性作家艾丽斯·沃克、托尼·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论述了两位女性作家塑造黑人女性身份的不同之处，是国内较早进行莫里森比较文学研究的著作。其他的代表性成果有王秀梅的《历史记忆与现实世界的冲突——威廉·福克纳与托尼·莫里森的对比研究》，该论文指出福克纳与莫里森作品间的共同主题——美国南方传统文化，二者的作品均背负着沉痛的历史记忆，亦对所处现实怀有不满情绪。此外，赵文书以论文《重复与修正：艾丽斯·沃克对拉尔夫·艾里森和托尼·莫里森的继承和超越》论证了艾丽斯·沃克对两位非裔作家有关性别与种族主题的扬弃。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不不断发展，部分中国学者积极探索有别于西方批评传统的崭新视角，对莫里森的作品展开分析。其中，文学伦理学批评便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视角，代表性较强的研究成果有修树新的《托妮·莫里森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笔者的《游走于黑白文化间的“文化孤儿”——〈柏油娃娃〉中吉丁的伦理困境》以及李芳的《〈宠儿〉中的母性伦理思想》。三者的研究涉及生存伦理、家庭伦理、人际伦理、文化身份伦理、母性伦理等多个维度，对莫里森作品内部的伦理问题以及其所折射出的莫里森的伦理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

尽管学界热衷于钻研莫里森及其作品，但对于其创作中的非裔流散元素却鲜有涉足，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她一众的文学作品中，莫里森以震耳欲聋的雄辩探索了黑人叙事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其笔下繁盛的主题难免会分散人们的研究兴趣；其次，尽管莫里森多次强调其作品的解读应以非洲为中心开展、深入，但是学界内欧洲中心主义的根基依旧牢固，非裔流散元素在其审视下难免沦为学者研究的旁枝末节；最后，尽管非裔流散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视角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便愈渐风靡，但是莫里森并未亲身经历传统意义上三角贸易的流散浪潮，许多学者在研究莫里森的路途上由于默认莫里森非流散作家的身份而不幸与其作品中的非裔流散元素失之交臂。

20世纪中后期，非裔流散继承非洲研究传统，顺应全球时代脉搏出现，其问世进一步打破了地域文化的双重壁垒，拓展了历史考察的跨洲视域。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关于非裔流散作为一种关键工具的零星研究无处不在，例如1976年马丁·基尔森(Martin Kilson)和罗伯特·I.罗特伯格(Robert I. Rotberg)共同主编的《非裔流散：诠释性论文集》(*The African Diaspora: Interpretive Essays*)首次将“非裔流散”纳入题目，汇聚16篇批评文章，探讨了非裔流散群体“母文化”被剥离的苦楚以及在“他文化”下扎根的艰辛。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批评家们才对这一关键视角产生了浓厚兴趣，大量研究陆续涌现，约瑟夫·E.哈里斯(Joseph E. Harris)主编的《非裔流散的全球维度》(*Global Dimensions of the African Diaspora*)第二版于1993年出炉，与1982年的第一版相比，更多前沿成果被收录，非裔流散从地中海地区到拉丁美洲

国家在内的地理范围也得以扩充。然而，尽管修订版填补了第一版遗漏的关键领域，但是鉴于流散视角的错综纷繁以及学者个性化的研究重心，任何文集想要全面起底流散这一问题绝非易事。10年后，帕特里克·曼宁 (Patrick Manning) 在《非洲与非裔流散：研究新维度》 (“Africa and the African Diaspora: New Dimensions of Study”) 一文中指出《非裔流散的全球维度》“所呈现出的非洲流散研究仅聚焦于流散的再生与转型，而非起源” (492)。

虽然非裔流散日益受到学界的青睐，但是在莫里森大量学术研究的映衬下，国内外关于莫里森及其作品的非裔流散研究仍然不足。在西方，截至2024年12月29日，在PQDT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中将标题设置为“托妮·莫里森”可以搜索出267篇博士论文和154篇硕士论文。然而，其中只有两篇满足标题中同时包含“托妮·莫里森”和“流散”这一条件。其中，莱恩·廷·布拉克斯 (Leantín Bracks) 出版于1996年的博士论文《流散女性文学的历史、语言和形象/身份》 (*History, Language, and Image/Identity in Selected Works of Women of the Diaspora*) 是第一批将莫里森的作品列为流散文学的一部分的著作。然而，本书本身就属于比较研究，因而《宠儿》的讨论只是其研究成果之一；而玛丽亚·辛图拉·桑切斯 (Maria Sintura Sánchez) 则专注于莫里森的第四本小说《柏油娃娃》，将视野跨至现代非裔流散分支之间的动态交织，强调在这一运动下将孕育抵抗霸权的崭新途径，然而，该书在关注流散终点后不同非裔流散分支的交互连接时，忽视了对其历史渊源的探讨。而即使将标题设置成“托妮·莫里森”，将摘要设置成“流散” (Diaspora) 或“流散的” (Diasporic) 来扩大搜索范围，仍然只有12篇博士论文和3篇硕士论文对此进行了粗略的讨论。其中，迪昂·N.明托 (Deonne N. Minto) 1999年的硕士论文《文化自戕、岛屿退居和流散启示——葆拉·马歇尔的〈寡妇赞歌〉和托尼·莫里森的〈柏油娃娃〉社会历史分析》 (*Cultural Suicides, Island Retreats, and Diasporic Revelations: A Socio-Historical Approach to Paule Marshall's Praisesong for the Widow and Toni Morrison's Tar Baby*) 中明确地讨论了流散的问题，承认了加勒比海地区因布满流散伤痕而迸发出的历史意义，论述了游离在黑白两个世界的流散后裔们如何在此地认清自身的无根处境并重塑黑人族裔身份。一些期刊文章也探讨了这一问

题，但总的来说，从流散的角度对莫里森的作品进行研究仍然是一个缺乏系统性总结的领域，西方大多数莫里森流散研究都是从其最具代表性的流散小说《柏油娃娃》及早期作品切入，也并未对莫里森笔下洋溢的流散元素进行全局把控，因此，我们仍需要在理清非裔流散的历史脉络后，对莫里森较新、较少讨论的作品进行研究。

中国学者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即莫里森研究存在学术成果总量庞大与流散问题研究不足的失衡。使用“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截至2024年12月29日，共有23篇博士论文和1006篇硕士论文进行了莫里森相关的研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将关键词换为“飞散”“离散”“散居”等流散的其他中文译介，也仅有2篇博士论文和2篇硕士论文涉及了流散问题。其中，窦永君2016年出版的硕士论文《放逐，错置和回归——从离散文学视角解读〈所罗门之歌〉》从流散文学中“放逐”“错置”和“回归”3个重要概念出发，解析了《所罗门之歌》中主要人物面临的生存困境与多种冲突，但在其聚焦系统压迫与个体放逐的同时，难免忽视了非裔族群离开故土、辗转异地的流散遭际；两年后，管晓明的硕士论文《托尼·莫里森小说〈家〉中的流散现象探究》就《家》为对象探讨了流散与回归问题。关于这个话题的期刊文章也较少发表，但近年来随着流散研究在国内的关注度不断上升，未来该话题下更多文章发表的趋势将不可避免。在已发表的文章中，2014年段军霞的《流散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族裔认同——基于托尼·莫里森小说》一文以莫里森的小说为蓝本，基于流散民族的特征，分析了美国黑人的历史记忆及其对于黑人获得民族认同的重要性，但由于篇幅限制，该文并未对黑人流散经历有更多详尽的叙述；而王丽2015年刊出的《飞散视角下托尼·莫里森的写作》是关于流散问题研究比较全面的一篇，然而，在其分析中，作者遗漏了关于莫里森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流散作品《柏油娃娃》（1981）以及对当代非裔新一波流散潮的相关讨论。

虽然关键术语的变化可能会带来更多相关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国内外对托妮·莫里森的研究往往局限在非裔美国文学的框架内，对其中非裔流散维度的关注仍然不足。一些学者，如特蕾丝·希金斯（Therese Higgins）和拉维尼亚·德洛伊丝·詹宁斯（La Vinia Delois Jennings），承认非洲文化对莫里森写作的影响。诚然，莫里森认可非裔美国人身份、历史与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相信非洲主义以一种令人信服且不可避免的

方式影响着美国文学的结构，并曾坦言其“宇宙学”的最终源头是非洲文化本身。此外，莫里森作品中不断化用的非洲民间传说和神话也进一步证实了非洲文化在莫里森书写中的地位。然而，这些学者研究方法的核心是广义上的互文性研究，因为其关注的是莫里森的作品如何适应、同化、延伸和改造非洲文化，而不是关注非洲后裔的流动和定居。

近年来，随着新时代跨境人口的急速流动，流散文学与流散研究也愈加火热；同时，更多的学者也意识到莫里森作品中跨国主义和流散元素的价值，号召学界不应将莫里森研究局限在非裔美国文学的框定内，而是要将其文本放置到跨越美国本土的视野加以探视。例如，特萨·罗伊农（Tessa Roynon）在《剑桥托尼·莫里森简介》（*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oni Morrison*）中便指出，莫里森一贯提到“非美国的地点和身份，或涉及美国但不发生在美国本土的事件”，因此她的小说“预示着，或者至少符合了美国跨国主义定位的理论转向，这种跨国主义定位反对将美国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独特且优越的民族主义特权实体”（111）；而伦敦格林威治大学在2017年举办了一场名为“全球莫里森”（Global Morrison）国际学术会议，该会汇聚了众多国际学者，在探析莫里森作品中的跨国主义和流散维度的同时，考察、质疑并更新了后殖民研究下批评话语，进一步印证了莫里森研究从本土到国际的研究转向。

因此，笔者认为现在尝试从流散的角度对莫里森作品进行全面探究的时机已经成熟。与目前已有研究中更多地关注她早期的作品不同，本书将考察莫里森自入文坛以来所有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研究相对较少的后期作品；其次，本书将从时间性和地缘性上完整考察莫里森作品中囊括的现代三波非裔流散浪潮，同时解析这三波非裔流散浪潮相对应的三大基本问题，即非裔族群创伤性的流散以及背井离乡与文化除根的漂泊经历、非裔族群试图在流散接收地挣扎生存并建设或重建家园的艰难与努力，以及非裔流散族群对故土的怀恋与实际上或想象中对家园的回归；最后，本书试图打破以往流散研究中根据社会政治现状确立的地理边界单一的划分方式，将美国南部¹作为当代非裔流散的出发点和回归点，从

1 将美国南方作为一种文化划分，而不是严格的地理划分，指的是基于梅森—迪克森线（Mason-Dixon Line）与俄亥俄河的前）蓄奴诸州。更多地使用的是其文化所指。对该概念的具体界定与阐释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二小节。

而不仅完整了非裔流散的地理路线，而且钩沉出非裔流散从奴隶制时代到现代的时间耦合。另外，本书还将莫里森的叙事行为作为广义上的文本，探讨其叙事特点所体现的非裔流散元素。莫里森多部作品中出现了对过去记忆的回溯，这与非裔流散重要意象及理念桑科法(Sankofa)所强调的对过去的认知和记忆的重要性不谋而合。研究也指出了莫里森最具流散特征的叙事构思，即如同非洲音乐形式一般的“呼—和”式(call and response)叙事构思以及放射性/辐射式叙事。

三、本书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本研究按照时间顺序从流散的角度考察了莫里森的文学创作。通过探讨莫里森对非裔流散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处理，即流散与无根状态、家园建构或重建的努力、想象中的与实际上的回归，揭示了莫里森对非裔流散群体创伤性流散经历的关注，展现了她对非裔美国人精神文化家园的持续探索。此外，本书还阐释了莫里森如何重视美国南方黑人互助互爱的人文精神，将其视为当代非裔美国人集体流散创伤的治疗方法，以及家园(再)建设的精神支柱。

尽管书中将莫里森的所有小说及剧本《苔丝狄蒙娜》(*Desdemona*) (2011)都纳入了讨论的范畴，但根据与非裔流散话题的相关性，本研究将重点聚焦莫里森的7部小说，即《所罗门之歌》(1977)、《柏油娃娃》(1981)、《宠儿》(1987)、《爵士乐》(1992)、《天堂》(1997)、《恩惠》(2008)和《家》(2012)，这些小说最能说明莫里森对非裔流散问题的看法。同时，莫里森本人是一位热衷于社会政治问题和文学批评的评论家。因此，其大量采访以及一些批评作品集，如《在黑暗中弹奏：白色与文学想象》(1992)和《在边缘移动：非虚构类作品选集》(*What Moves at the Margin: Selected Nonfiction*) (2008)也将成为本研究有力的支撑材料。另外，由于流散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背景，相关史料及其他非裔流散作者也均有涉及，以供参考和比较。

考虑到流散的性质以及莫里森作品中所呈现的非裔流散活动的时空特征，将本书的主要结构分为5章：“流散概念及其理论发展”“奴隶贸易